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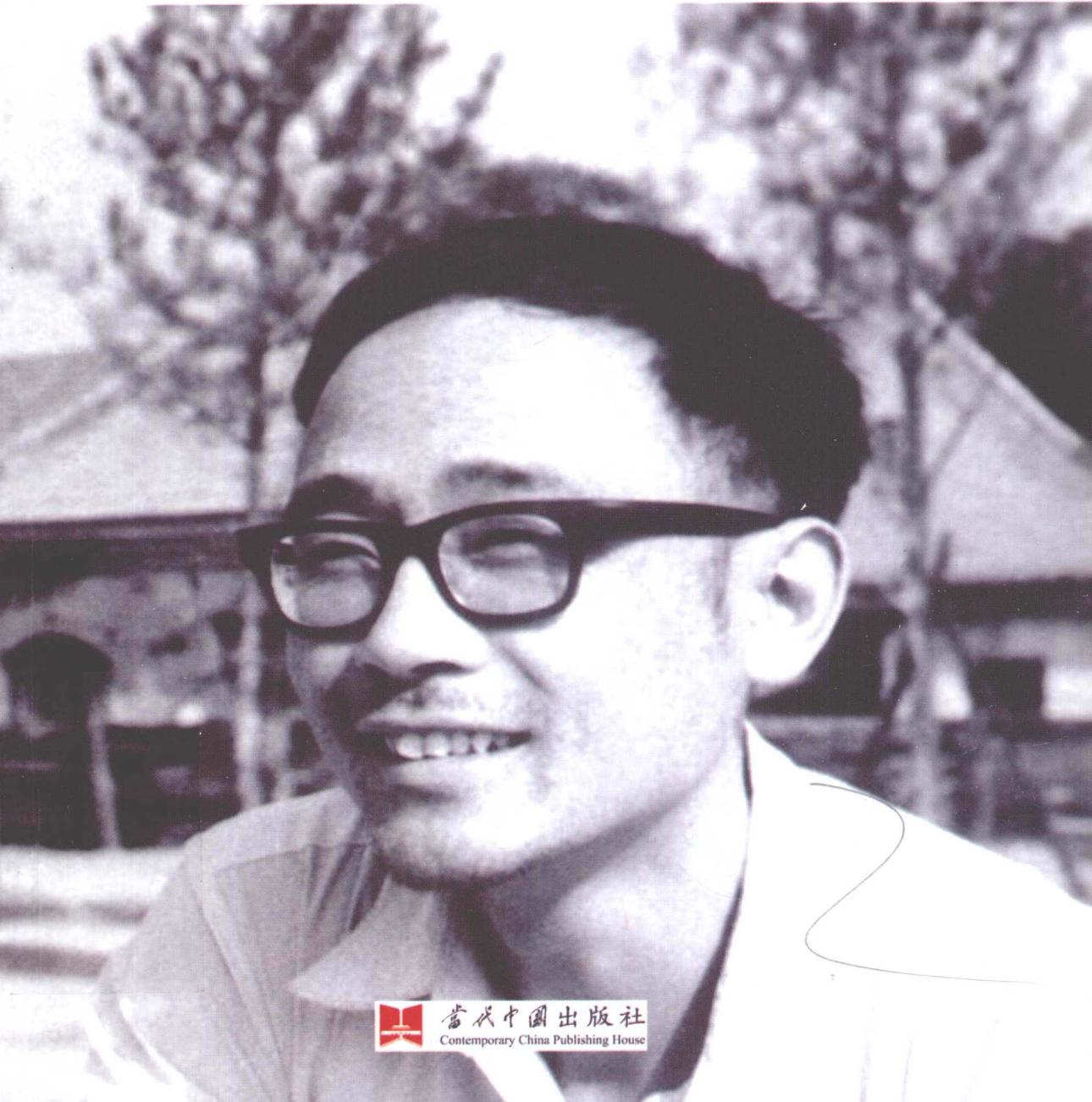
1966—1968：高三 1968—1975：插队 1975—1978：铁路 1978—1982：大学

我的知青之路

葛元仁◎著

这是一个工程师的文字，没有修饰，没有文采飞扬，只有一段朴素而真实的历史！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我的知青之路

葛元仁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知青之路/葛元仁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80170-986-8

I. ①我… II. ①葛…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9642号

出版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唐运锋

封面设计 鲁玉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场部 (010)665722811或66572155/56/57/58/59转

印 刷 河北省香河县闻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印张 插图119幅 221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转出版部。

前　　言

本书为纪念插队四十周年而写，所有内容都取自当时的日记、笔记等。

初中时，校长作报告：“毛主席说，‘一个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是什么呢？只能是行尸走肉。”校长的这句话，促使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政治观点是正确的”，进而一生都在寻找“正确的政治观点”。在寻找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人如果没有正确观察事物的方法，就等于盲人骑瞎马，无法找到“正确的政治观点”。这样当面临纷纭的社会现象，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只能是怨天尤人。所以，找到“正确的政治观点”的关键是拥有正确观察事物的方法。

只有通过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用人类创造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备正直、勇敢、坚持正义、不怕打击、富有同情心的品质；才能掌握正确的观察事物的方法，不被事物纷纭的表面现象所蒙蔽；才能实现用知识造福于社会，脚踏实地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才能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自己只是无数同龄人中的一分子。

每个历史时期的青年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追求真理，报效祖国，造福人民”应该是任何时代青年面临的永恒主题。

现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有种种议论。确实，在我们插队中曾经发生了很多问题，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远离父母，告别了熟悉的城市生活，来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还要面临住房问题、吃饭问题……之所以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造成的。当时的农村，基本上还是原始的耕作方式，农民的生活也很艰苦。面对这一切，我们知青们走过来了。这除了人类对环境适应的本能，农民群众的关心帮助外，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的事迹和中学的革命理想教育培养我们敢于克服困难的勇气，也起了决定性作用。有的年轻人说，你们知青活了两辈子，经过了农村和城市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确，农村的这段生活增加了

我们的阅历，使我们对中国有了真真切切的深入了解，为后来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基础。

对知青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总理一直非常关心，他的态度是“国家关心，负责到底”^①。毛泽东主席亲自给反映知青问题的李庆霖回信，指出“此类问题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并且寄去了300元钱给予帮助。^②中央对侵害知青的问题采取了法律和行政措施，枪毙了个别严重迫害知青的干部，并要求各级政府解决知青的生活困难问题。

对知青中存在的问题片面地扩大化，是很不妥当的。现在影视作品有不少是反映这些问题的。有些作品把那些当时就为广大知青所鄙视的个别知青的行为，以巧妙的艺术手段在社会上扩散，甚至掺入了早就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封建血统论观点，使得整个社会对上山下乡的知青产生了不应有的偏见，极大地诋毁了一代知青为社会发展做出奉献的正面形象，歪曲了上山下乡知青的历史。本书是对现在反映知青生活的影视、文学作品的一种补充。在知青中，确实有现在文艺作品中描写的人和事，但这绝不是知青的主流。实际上有不少知青在同样面对生存危机的同时，在和农民的共同劳动中，在和群众的交流中，不仅学到了勤劳纯朴、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勤俭节约、不怨天尤人的精神，体会到了中华民族的命脉所在，而且对农村的状况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找出了一些农村贫困落后的的原因。在我所接触的知青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忧国忧民，社会正义感很强，回城后也都成了各自工作领域中的骨干。我觉得有必要反映这部分知青的历练过程。这些知青独立思考、不盲从的理念，体现出了“你们可以剥夺我的任何权利，但是无法剥夺我思考和学习的权利”；“你们可以限制我的所有行动，但是无法限制我帮助他人的行动”；“你们可以从各方面压制我，但是无法压制我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正义感”。这些知青“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中国的脊梁。我觉得这些才是知青的灵魂，而我只是无数这样的知青中的一分子。

没有人能够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历史也没有“如果”。任何人只能在

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②同上，第101页。

历史的舞台上扮演形形色色的角色。

对一个群体的社会行为的评价必须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也就是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根据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看看这个群体在当时的所作所为是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社会文明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社会文明的发展。不应以一时一地的个别情况、经历者的个人恩怨来考察一个群体的作用，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不能“泼洗澡水时，连婴儿也一起泼了出去”。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不管是自愿去插队的，还是被迫去插队的，也不管你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客观上广大知青都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首先，我们从社会财富的消费者，变为了社会财富的生产者，为国家分忧解难，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其次，因为广大的插队知青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又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培养了坚毅的性格，所以他们能够承受改革开放初期的阵痛，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人民日报出版社在上山下乡 30 周年的时候，出了一个“与共和国同行”的光盘，是张爱萍将军题的名字。当记者采访回城后又下岗，在卖报纸，做裁缝，当保姆的几个女知青时，她们的回答是：“过去插队时那么艰苦的生活都挺过来了，现在比插队时好多了，我们能够挺住。”这就是知青！顾全大局的知青！一些国家的改革失败，工人一失业就引起社会混乱，而中国却没有。这不能不说下岗的知青在其中起到了强大的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又一次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奉献。再者，知青们把城市的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的理念带到了农村，影响并且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农村落后的思想观念，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大批的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不少知青担任了大队、小队干部、赤脚医生，在普及农村教育、生产管理、科学种田、医疗卫生事业上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样的具体例子不胜枚举。这难道不是另一种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吗？

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记录的可贵，在于她的真实。唯有真实，才能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历史是人民群众写的，不是史学家编出来的。知青史也只有我们知青自己来写，希望每个知青把自己的历史写出来，组成一部真正的中国知青史。“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就像没有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就不可能有抽象

的“人”一样。没有每个知青的知青史也不可能有整个知青史，没有整个知青史，中国的历史就会有缺损。

知青的过去不仅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一种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一种不甘沉沦的奋起精神。

在蹉跎的岁月中他们奉献了青春，为社会做出了牺牲。现在，他们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仍然在作奉献，他们是中华民族杰出青年的代表。全体知青都能够再作的奉献，就是总结自己以前的奋斗、奋起的经历，留给后代，让他们知道父辈是在怎么样的历史环境中为社会作出奉献，进行奋斗的。

正是由于有一批像知识青年这样的无私奉献者，这个社会才得以不断前进。可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些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社会上出现了巧取豪夺的腐败分子，奉献者被盘剥，甚至一些人把奉献者当做傻瓜。国家要鼓励人民甘于奉献，就要从严惩治腐败，奖励那些无私的奉献者，否则，就会寒了奉献者的心。

本书曾于2009年5月由香港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出版，虽然未在内地正式发行，但仍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尤其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采访后，索书的朋友络绎不绝。本次在内地出版前，对书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充实，并将当时阅读过香港版的部分同志对此书的评价附后，供后来的读者参考。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聂新元、郇中建、王子生、李奎章、黄继之、王惠娜、任公伟、胡生、林春生、金羽高、朱平之、于福云、李子健、刘建章、王晓明、靳建疆、乔普湘、姜成武等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葛元仁

2010年10月9日

引 子

对于“老三届”中上山下乡插队的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它让无数的“老三届”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文革”中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将 1966、1967、1968 年初、高中毕业生及后来的中学毕业生几乎全部送去插队，人数达到了 1776.48 万之多，^①使得“知青”这个专用名称在社会上越来越多地被提起，在各个角落被叫响。因为涉及的人数众多，波及了千百万家庭，知青的余波至今还在荡漾。

对于“文革”，中共中央在 1981 年 6 月 27 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做了总结。正如恩格斯说的：“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②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从中学习到了不少东西。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当时懵懵懂懂，刚刚开始懂事的中学生来说，却是一下子被推到了根本不理解的政治斗争旋涡中去的。

在这场突如其来 的政治运动中，一些人沉沦，自甘堕落；一些人迷茫，随波逐流；一些人奋起，追求真理。总之，大家都各自开始了自己人生的道路。

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8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85 页。

目 录

前 言	1
引 子	5

第一章 中学——动荡中磨砺 1

一、“文革”中的高三	2
二、思考、抗争	13
三、徒步长征	18
四、“文革”风云变幻	22
五、军训、复课闹革命	30
六、我的父母	48
七、告别中学	57

第二章 农村——新天地中磨练 66

一、环境、劳动、生活	67
二、风雨搏击	85
三、叛徒和八路军情报员案	96
四、学习与思考.....	107
五、传道、授业、解惑.....	121
六、大学梦破灭.....	132
七、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138
八、知青生活调查.....	158

第三章 铁路——工作中锤炼 175

一、铁路上的知青工人	176
二、政治洗礼	180
三、团委书记	188
四、大学的召唤	198
第四章 大学——全新的挑战	206
一、学习生活	207
二、学生会主席	214
三、学生食堂和伙食	231
四、校园卫生	234
五、教材、教学、考试	235
六、党员发展	237
七、信任	241
结束语	250
附录一：怀念父亲——记我国国防科研的老专家葛叔平	256
一、首次核试验中的父亲	256
二、首次卫星回收中的父亲	260
三、“文革”中的父亲	263
四、解放前后的父亲	267
附录二：书评	276



第一章 中学——动荡中磨砺

在一阵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口号声中，北大附中几个穿着军装的同学在礼堂的讲台上，捋胳膊挽袖子，手舞足蹈地大讲特讲“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封建血统论观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用这种形象的语言来宣扬唯成分的“血统论”。开始还觉得挺新鲜，后来仔细一想，不对啊……

一、“文革”中的高三

1966年，又是一个春暖花开季节的周末，我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完成今天高考复习计划。从学校附近的八里庄商店买了一点肥皂、牙膏等日常生活用品，我在暮色降临之际匆匆回到学校。一进校门，就遇到了班主任。下周日就要召开高三年级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家长会了，而我的父母因为国防科研工作的需要，随部队研究所从北京搬到石家庄去了。所以，我就问班主任：

“李老师，下周日开家长会，是否需要我父母来北京参加？”

他说：“你父母在石家庄，就不用来了。”

我又说：“那让我在北京的监护人、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姨妈来？”

他说：“你的家长和监护人都不用来，你还考不上大学？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师院附中别办了。”

别人要是听到这种说法，肯定是心花怒放，自信心倍增。但是对我来说，却不是这样。我知道老师这么说是因为：全校能够在中学连续六年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针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习成绩优良奖状”的，只有我和班里另外两个同学。当时，各科的老师在复习时，也都对我们说：“你们几个学习好的，坐到后排去。也可以不听我的课，自己觉得需要复习什么，就复习什么。”

20世纪90年代中学母校校庆，刚进校门就遇到了当年教我化学的王老师，他指着我对周围的人说：“咱们学校考不倒的学生回来了。”弄得我不知所措。他在教我化学的时候，从来不轻易给我的作业和实验报告打满分。一次我看到和我用同样方法做实验的同学得了满分，而我却没有，就去找他评理。他对我说：“你这样的学生，就不应该只用一种方法做实验，至少要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我才能给你满分！”老师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我去进行更多的思考和学习。

教我立体几何的王老师也是这样，他经常拿我们和另外几个同学的作业

作为标准答案贴在墙上，让其他同学看我们的做题思路和方法。一次期中考的卷子发回来后，我是满分。但是我自己发现自己的一道题并没有完全做对，就去找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得满分。

他对我说：“你现在知道怎么做了吗？”

我说：“知道了啊。”

“那分数就不用改了。”

“那不好吧？”

“多出来的分数，是对你诚实的奖励！”

虽然班主任和其他课任老师，对我考上大学充满信心，因为在师院附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高三年级的前三名。但是，我心里根本没底，因为我一直没有被批准加入共青团，而排在前三名的另外两个同学都是共青团员。在当时“政治表现”是第一位的，不是团员就说明你政治上不可靠，大学招生时势必要受影响。初中升高中时，因为我和另一个同学不是团员，就没有被保送。高中三年来，这个阴影始终笼罩在我的心头。现在又碰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心里沉甸甸的，思想压力很大。最近的几周，我发现班团支部全体团员经常开会，有时还争论什么。

后来，一个团支部委员告诉我：“当时，就是争论是否应该发展你入团。一些人认为你虽然学习好，但不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也不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还说过一句‘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证明你没有阶级觉悟，是走‘白专’道路。另一些人认为，党交给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好，证明你听党的话，而且你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是‘红专’的表现。团支部一直没有统一意见，所以一直没有发展你入团。”

其实我早感觉到了，班里些特别“革命”的“左派”，自认为血统高贵，是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们一直有一种优越感。如果让我入了团，在政治上就和他们平等了，我的学习又比他们好，他们就会有一种失落感。所以，高中三年里他们就找种种理由，不同意发展我入团。尽管我父亲在部队从事尖端的国防科研工作，但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成了他们反对的理由。

一次课间操后，碰到教我语文的郭老师，他问我：“你怎么还不是团员？”

我说：“是啊，我一直要求入团，可是没被发展、批准。”

他又说：“我看你这么积极地参加学校的各项社会活动，学习又好，以为你早就是团员了呢。”

高一时教我生物的刘老师，在这段时间前后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她甚至开玩笑地说：“我还以为你是‘老团员’了呢。”

其他很多老师和同学也对我还不是团员感到惊讶。面对这种情况，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自然也增加了我对班里“左派们”的看法。但是我觉察到：在许多人眼里我的表现已经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了。

因为班里团支部中的一些人一直反对发展我入团，学校党总支便在老师中间了解我的表现。虽然当时非常注重家庭出身，但是学校党总支对我父母的情况是了解的。父亲随部队调离北京时，为了我能够住校，读完高中最后一年，部队专门派了一个秘书到学校，介绍了父母亲的情况。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学校领导发现临近高中毕业的我还不是团员时，就通过班主任做团支部工作，要求他们发展我入团。但是，“文革”的来临，使这些都成了泡影。

1966年4月，学校组织政治学习，让我们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这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进入高考复习冲刺阶段的高三学生来说，无疑是额外的负担。我们对1965年末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越来越热的政治气氛浑然不知，对于我来说更是这样。3月21日，我刚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参观了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世界领先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核反应堆中为控制反应速度用镉棒在重水中吸收核反应过程中多余中子的模拟试验、电子管计算机的高速运算、激光通信和其他先进技术等都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一门心思地想要考上大学，准备将来从事科研工作。因此，我对于这种批判一点也不感兴趣。而且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学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批判这些杂文，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问题。

对于北京师院附中（现为首都师范大学附中）的“老三届”学生来说，1966年6月7日是告别中学正规教育，被迫卷入“文革”的日子。

那天，轮到我带全校的课间操。我和以往一样，在领操台上随着广播喇叭中的音乐做完最后一个动作后，对着操场上的全校同学，发出了集合的口令，同学们迅速向领操台聚集过来。

这时，学校教导处杜副主任走到领操台下右侧对我说：“不要喊解散，艾校长要讲话。”

同学们集合到领操台下后，我说“艾校长要给大家讲话”，便跳下了领操台，站在台下左侧听校长讲话。

校长讲话的大意是：最近一些同学不认真学习，晚自习时聚集在一起发表一些否定建国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的言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广大同学不要听信这些言论，要在党总支的领导下，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安心学习。

正当校长讲话的时候，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带着几个同学，一下子冲上了领操台，粗暴地打断校长的讲话，并且在领操台上和校长进行辩论。说校长是在放毒，压制同学们的革命行动，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且号召同学们不要上课，起来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

领操台上乱成一片，个别学生开始推搡校长。我跳上领操台，招呼我们班的王晓明、刘建章等几个同学上来将校长保护起来，簇拥着他从领操台上下来，护送着回到了校长办公室。我们怕那些同学再来冲击校长办公室，就在办公室外把守，当时听到校长和学校其他领导议论：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直重点培养、呵护的这个刚被批准入党的高干子弟会这样对待他们。操场上大多数同学看到校长离开，也陆续离开了。而这个女生仍旧在领操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一直到上课铃声响起，少数留在操场上的同学也全部回到教室。而后他们又冲击，并且企图占领学校广播室，继续宣传他们的观点，在不少同学的抵制下没有成功。从此，这个女同学和他们那些“造反派”，再也没有回到教室上课。

从这天开始，学校进入了半无政府状态。一些同学开始不上课，到校外进行“革命串联”和“造反”活动，老师也不敢管理。尽管大部分同学依旧按时上下课，但是课余时间也都对此事议论纷纷，无法安心学习了。

作为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我和班里大多数同学一样，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备考复习中，对那个女生及他们一伙人的行为完全无法理解。当时一些同学在一起议论说，这个女生和追随她的几个人，平时学习成绩都不好，可是又都非常“革命”。按照有的同学的说法：“对单词记不住，记别人说的话，记得可清楚了”，“经常抓住你的一句话，就上纲上线地批判你”。难道他们要通过这种方式上大学？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偷看了发给他们父辈的

《五一六通知》，才采取了如此的“革命造反行动”。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的发表，以及学校内少数人的鼓动，正常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了。为了稳定学校秩序，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向北京的大中院校派出了工作组，来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中旬工作组进校，成立了由工作组指定成员的“文革委员会”，其中全部都是反对校党总支的那部分高干子女“造反派”（当时凡是反对单位领导的全被称为“造反派”），带头造反的那个女生也被“结合”进去了。在工作组的主持下，学校开始全面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校长代表党总支做了检查后，所有领导就“靠边站”了。7月末，那个女生又批判工作组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把工作组赶了出去，把持了学校“文革”的领导权。7月28日学校广播通知，全体同学到礼堂开会。原来是他们请来了北大附中的同学，在学校礼堂介绍“革命”、“造反”的经验。在一阵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口号声中，北大附中几个穿着军装的同学在礼堂的讲台上，捋胳膊挽袖子，手舞足蹈地大讲特讲“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封建血统论观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用这种形象的语言来宣扬唯成分的“血统论”。开始还觉得挺新鲜，后来仔细一想，不对啊，要是这样，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岂不是在娘胎里就被决定了？那一直强调的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的思想改造，不就没作用了？这不是把党对个人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政策中的“成分”篡改为重在“出身”，扩大了打击对象吗？出了礼堂后，我问身边的一个同学：“北大附中同学里那个特别‘狂’的女生是谁？”他告诉我：“那个女生是‘中央文革’在中学的联络员，还被江青称为‘小太阳’呢！”第二天的对联辩论会上，会议组织者公然让“红五类”坐到左边，其他同学和老师坐到右边。与此同时，我们班的那个女生带着她的几个同学开始组织“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即红卫兵），并号召大家参加。起初任何人只要自愿，均可以加入，并且还张榜公布了红卫兵成员名单。没过两天，他们又张榜公布，把其中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全部开除。最后只剩下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功绩的中高级干部子女（这个“红卫兵”后来在北京中学生中被称为“老兵”，也是现在一些文章中指的红卫兵），

实际上成了中央一再反对成立的“红五类子弟协会”^①。为了表示与众不同，他们给自己佩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种认为革命队伍必须要纯之又纯的“左”倾做法，当时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感。

我的父亲虽然解放以来一直在部队从事国防尖端科研工作，当时也仍然在部队工作，但是，我还是被列入非“红五类”中。说我出身不好，表现混蛋，把我开除了。由于学习成绩好，还被一些人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而这个红卫兵总部的领导成员，就是“文革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在他们的主持下，学校的红卫兵到校外“破四旧”、“抄家”、打人，参加“八一八”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接见，开证明到外地进行“大串联”。在校内，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名，强迫老师“劳动改造”，对老师进行批斗。对其他同学，则不仅不让他们参加“破四旧”，也不允许他们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接见，更不允许他们乘火车串联。红卫兵还以“文革”核心自居，让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成立“红外围”（红卫兵外围），听命于他们的指挥，而“黑五类”（指地富反坏右子女）连“红外围”都不许参加。“文革”前，学校一直要求同学们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基本条件”^②衡量自己，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此人人都想参加“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而这种人为的政治歧视，必然引起了校内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观点的激烈辩论。在一次辩论会上，一个高一的同学提出：“江山是我们父辈打下来的，我们子承父业，是理所当然的革命事业继承人，为了保卫已经获得的政权，用什么手段都可以，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其他人根本不具备当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条件！”更有甚者说：“我们生来肩膀上就是扛肩章的，就是领导你们，管你们的。”学校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几乎都是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真正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走资派”内容的大字报与之相比，相形见绌，寥寥无几。

“老兵”们的这些言论和行径自然激起了很多同学的不满，除了“老兵”外，没有人再听从“文革委员会”的领导。虽然他们先是忙于社会上的“破

①张化、苏采青：《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6页。

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